

反對運動中的路線分歧： 從「國家性」視角比較香港（2006-2019） 與台灣（1975-1986）的啟發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當前在面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上，台港兩地的民主運動有著高度的共鳴，但是，兩地似乎處於不同的民主化階段。本文嘗試從「反對運動」的角度來進行台港兩地民主化發展的比較，特別是以台灣1975至1986年期間的反對運動經驗，與香港2006至2019年所面對的民主運動困境，兩者進行相互的對照。文中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在反對運動中所出現的內部分歧，在當時台灣黨外的主要分歧形式是「議會路線／群眾路線」、「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雞兔同籠問題」，香港則是在「泛民／本土」的對立架構下出現了「民主回歸／香港獨立」、「和理非非／勇武抗爭」這些運動內部的對立。然而，同樣面對運動內部理念或路線的分歧問題，為什麼台灣在1986年得以創立「民主進步黨」這個本土政黨，開啟了台灣政黨政治競爭的時代？反觀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卻需要以「無大台」這種特殊的形式來團結民主運動中不同陣營的力量？為了解釋上述問題，本文以「國家性」此一理論概念作為台港比較的基礎，進一步去探討「中華民國台灣化」與「一國兩制」所形塑的不同國家性狀態（一致型／對峙型）對兩地民主化路徑所產生的影響，並觀察兩地在「激進化程度」和「組織化程度」這些運動型態上所呈現出的差異。

關鍵詞：反對運動、民主化、國家性、一國兩制、中華民國台灣化

台灣社會學第46期（2023年12月），頁1-46

收稿：2023年7月13日；接受：2024年1月3日

* 通訊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Email: tbcheng@mail.fgu.edu.tw

Political Cleavages in Opposition Movem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2006-2019) and Taiwan (1975-198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ness

Tsu-bang Ch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Foguang University

Despite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regarding the influences of the China factor, Taiwan and Hong Kong are experiencing different stage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are the opposition movement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s opposition movement from 1975 to 1986, we can gain insights into the recent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from 2006 to 2019. The central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divisions within the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Taiwan, the major political cleavages within the Tang-Wai movement ("outside the KMT party") were centered around the concepts of "parliamentary/mass line," "reform inside/outside the system," and "chickens and rabbits in the same cage." In contrast, in Hong Kong, the main political divisions existed between the pan-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localist camp, encompassing issues such as "democratic reunification/Hong Kong independence" and "peaceful, rational, non-violent, no foul language/brave fight."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is why these political cleavages led to different outcomes. In Taiwan, the 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in 1986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party competition. Conversely, in Hong Kong, the Anti-ELAB movement relied on a leaderless approach to unite diverse faction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attempt to employ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stateness" as the basis for comparing Taiwan and Hong Kong. This furth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tateness (convergent/antagonist) shaped by the approaches of "Taiwanizing ROC"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the two regions advanced on their respective democratic paths. Additionally, we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radic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presented in the movement patterns.

Keywords: Opposition Movement, Democratization, Statenes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aiwanizing ROC

一、前言

在當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下，台灣和香港可以說是彼此的「鏡中自我」，在兩地許多抗爭與集會場合中，人們高喊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都是在提醒彼此之間民主發展的連動性。筆者在其中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香港人在探討自身民主發展時，常會以台灣過去民主運動的經驗作為借鏡或比喻的方式。例如，2004年由民進黨和台聯所發動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就影響到同年香港所發起「牽手護維港」的活動。2018年「佔中九子案」之一的中文大學社會系陳健民教授在最後一堂課中，以「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為題發表演說。¹他提到七〇年代末中國和台灣的民主運動對他的影響，特別是台灣的美麗島事件，讓他發現原來知識分子也要走上前線。他說最記得那群知識分子辦雜誌社、遊行後被搜捕，施明德上軍事法庭被判死刑前卻露出不屑政府的笑容。當時有媒體亦將佔中九子案視為是對雨傘運動的大搜捕，一場港版的「美麗島大審」。此外，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Hong Kong Indigenous，簡稱「本民前」）的核心成員黃台仰（因被控暴動罪流亡德國），曾在媒體訪問中提到：「因為港台民主化階段不同，相較於台灣年輕世代，早期受到白色恐怖迫害的民主前輩，更令他高度共鳴。二二八、美麗島事件、鄭南榕已成了本土派年輕人常常提及的台灣民主象徵」（林怡廷 2016）。在 2016 年時，本民前所參與的旺角衝突，被練乙錚（2016）以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來加以比喻。他認為本土派的「勇武抗爭」突破了傳統和平非暴力的運動範式，是一種「暴力邊緣論」；所謂「暴力邊緣論」正是姚嘉文在黨外時期歷次的行動中所歸結出來的（古淑芳 1999: 75）。筆者訪

1 《端傳媒》（2018年11月15日），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115-hongkong-chan-kin-man-last-lesson/>

談一位曾參與旺角衝突的本土派青年時，他告訴我：「台灣 1977 年『中壢事件』中所發生的警民衝突，讓我覺得很有啟示」（訪談編號 HK160101）。這也讓筆者不禁將旺角衝突與中壢事件牽起了一條隱匿的歷史線索。

上述的現象讓筆者去思考，儘管當前在面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上，台港民主運動有著高度的共鳴，但是，兩地卻處於不同的民主化階段。台灣已歷經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進入民主深化的階段，而香港直到 2019 年還處於爭取全面民主的階段。所以，除了當前兩地民主運動的比較，本文嘗試提出，台灣 1975 至 1986 年面對威權體制的反對運動經驗，是否可以對同樣處於非民主處境（混合式政體）的香港反對運動（2006 至 2019 年）提供更多參照的意義？反過來這樣的參照比較，是否也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反思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不同特點？我們可以發現到，當時在威權體制的壓制下，台灣反對運動的長期戰略目標就是「組黨」。1986 年「民主進步黨」這個本土政黨的成立，可以說標誌著台灣民主發展上的階段性里程碑，開啟了台灣政黨競爭的時代。如同吳乃德（2000: 73）所提出的：「威權獨裁政權接受反對勢力的存在，並且願意和它競爭。此種政治權力的開放、對權力壟斷的放棄，是民主化最關鍵性的門檻。」反觀香港儘管看似有許多「政黨」和相關的政治團體，但是，香港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政黨法」，各大小政黨都是用「民間社團」的名義登記，或是立法局內的議員組織。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香港的「行政」與「立法」部門是兩條平行線，香港的民主黨派是「永遠的反對黨」，或說「政府內的政黨」（party in government）（Ma 2019: 140），完全沒有取得執政的機會與管道。更重要的是，相關的民主派政黨或團體，在 2006 年以後就明顯呈現出分散化和碎裂化的情形，從未出現能妥善引導群眾、具統合性的組織化力量。甚至在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試圖以「無大台」（沒有特定領袖、去中心化）這種特殊的形式來團結民主運動中不同陣營的力量。在台灣的反對運動中，同樣有過不同陣營在理念與路線上的分歧，那麼，為何兩者分別出現「民進黨

／無大台」這樣組織化發展上的差異呢？本文嘗試從台港反對運動中的分歧現象出發，並對相關現象加以比較和分析，從而對兩地反對運動的發展路徑與型態上的差異做出進一步的解釋。²

二、文獻探討與問題意識

台灣社會學界對於七〇至八〇年代反對運動的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且重要的研究成果，不同的研究者都以各自側重的角度對民主化發展中反對運動的「成功」做出了解釋。例如，王振寰（1989）從國民黨「政權正當性」來解釋七〇和八〇年代台灣兩次的政體轉型，其後湯志傑（2006）對王文的論點進行了批判性的反省。相較於此種結構論的觀點，吳乃德（2000）、王甫昌（1996）和蕭阿勤（2003）的論文則強調反對運動的行動者其背後理念、價值、共識、認同的重要性。王文從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進行討論，如何形塑反對運動參與者的「共識」是成功「動員」的重要條件。「世代」的議題則在蕭文中得到充分的解釋，例如七〇年代的黨外運動者，從原先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同框架轉變為八〇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認同框架。香港民主化的議題從 1990 年代開始獲得關注，特別是一國兩制對香港民主化的影響，其中包括將一國兩制視為一種「混合式政體」（hybrid regime）（Kuan and Liu 2002; Fong 2013），或從「諮詢式政治」（advisory/consultative politics）（Fong 2019）到不完善的「政黨」和「選舉制度」來說明香港受困的民主發展（So 1999）。另外，隨著香港政治抗爭的不斷升級，「公民社會」（Pepper 2008）和「社會運動」（Chiu and Lui 2000；鄭煒、袁瑋熙 2018）也一直是重要的主

2 審查人提出 1992 年台灣國會全面改選代表從有限民主走向全面民主，與香港國安法之後取消民主選舉可以形成對照性，作為兩者比較的時間點。不過，筆者認為本文整體的問題設定，是以「威權政體放棄對權力的壟斷」來標示不同的民主化階段，並且，此一問題意識的設定更涉及到對照「民進黨／無大台」，以及台港兩地反對運動組織化程度的問題。此外，1986 年以後台灣進入政黨競爭執政權力的階段，這是香港從未發展到的民主階段，可能反而會變成台港之間一個不可比較的部分。

題。近年對「本土意識」興起的討論，更是成為新的研究焦點（Wu 2016; Veg 2017; Ip 2020）。在眾多的討論文獻中，直接觸及台港兩地反對運動內部分歧現象的，主要是馬嶽對香港政黨與選制變化的研究，以及吳乃德從反對運動的「第二條陣線」對台灣反對運動內部分歧的觀察。

（一）香港反對運動的分歧：「選舉制度」的解釋

在馬嶽長期的研究中，主要是從選制（electoral system）的改變來解釋香港政黨內部不斷派系分裂（factionalism）的現象。儘管 1991 年開始出現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刺激了香港民主派的出現與整合，卻在 1998 年時從原本「簡單多數制」（first-past-the-post, FPTT）改為「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造成了香港政黨發展的分裂而非強化。³ 因為，在這樣的選制下小比例的選票就有當選機會，加上香港五大選區在選區劃分上一直沒有改變，而同選區直選議席卻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更進一步降低了當選門檻，吸引了更多人參選，無論民主派或建制派都分裂出新的政治力量（蔡子強、馬嶽、陳雋文 2021: 104）。馬嶽認為這樣的選制對香港的政黨發展帶來兩個不利的影響：首先，不利於形成強大的在野政黨（Ma 2019: 142）。就香港的實踐經驗來看，從 2012 年以來沒有單一政黨推薦名單可以在任何一個選區獲得兩席或以上。政黨的選舉策略往往就是分拆名單，因此會鼓勵小黨和獨立參選人進入。此外，香港的大黨縱使贏得多數也不會獲得執政權，降低民眾投票給政黨的誘因，使選民更著重個別候選人的形象與素質，明星候選人對選民的號召

3 在 1995 年，立法會 20 個直選議席是在 20 個選區採用「簡單多數制」，也就是「贏者全拿」（the winner-take-all），民主黨共取得 12 席，獲得大勝。《文匯報》的社論批判：「這是彭定康出於某種目的在密室炮製出籠的，目的是製造民主黨『一黨獨大』的局面」（馬嶽、蔡子強 2003: 23）。特區政府在 1998 年將選制改為 5 個選區，採「比例代表制」中的「最大餘數法則」（the Largest Remainder formula with the Hare quota）。台灣的「不分區立委」就是相同的選制，只是香港是在五大選區各自提出政黨的候選名單，台灣則是全國性的，前者選區範圍小、選民數少，後者範圍大、選民數多，這就讓同樣的選制在台港兩地產生不同的選舉效果。

力會超過政黨的標籤（蔡子強、馬嶽、陳雋文 2021: 96; Ma and Choy 2003: 355）。其次，在這樣的選制下，想要讓選票的效益極大化就需要對同選區的候選人進行協調（如：初選），或引導選民進行策略性投票（如：台灣的「配票」）。然而，由於欠缺具權威性的機制去進行協調工作（如：黨紀），反而在競選期間為爭搶選票而形成泛民陣營內部候選人互相攻擊的現象（蔡子強、馬嶽、陳雋文 2021: 97; Ma 2014: 194）。相較而言，建制派在議席協調和配票工程上都較民主派成功，因為不服從協調、未獲中聯辦支持的候選人往往當選機率極低（蔡子強、馬嶽、陳雋文 2021: 100-101）。

儘管馬嶽從選制變化的角度對香港政黨的發​​展做出了上述重要的觀察，對香港反對運動分歧現象的解釋力仍有所限制。首先，比例代表制的確可以對 2012 年以前泛民政黨「內部的」分化做出相當程度有效的解釋（Ma 2002, 2014; Ma and Choy 2003）。但是，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本土派與泛民政黨之間的分歧就無法純粹從選制的角度獲得妥當的解釋。一個具體的實例就是，2018 年九龍西補選中民主派落敗，代表民主派的李卓人敗選，由代表建制派的陳凱欣勝出。⁴ 為何一個選舉老將竟然輸給一個毫無經驗與政見的建制派新人？傳統上地區直選泛民與建制的票數是六比四，因此面對這樣的敗選結果，雙方交相指責、內鬨加劇。泛民派指責本土派都不出來投票、投白票或「焦土」（不投票給民主派甚至投給建制派）。本土派則指責泛民口號老化、空洞沒有建設性（如：「關鍵一席」、「顧全大局」），本土派絕不「含淚投票」。在這樣一對一的補選中，本土與泛民的分歧並沒有因為比例代表制影響因素的消失而變得團結，那麼，形成香港政治分歧更具決定性的基礎是什麼？筆者認為香港的選制無法「完全解釋」反對運動的分歧，只能說它「強化」了政治分歧

4 李卓人的背景可以說就是典型的老泛民，曾任支聯會主席、立法會議員、香港第二大工會職工盟秘書長、工黨副主席，在投入選舉前就曾自嘲自己是集「泛民、左膠、大中華膠」於一身的人。這樣的身分背景選前即受諸多爭議，並被認為難以取得本土派立場的選民認同。

的現象。比例代表制有利於具知名度的新人出頭，卻很難形成政黨或候選人之間的合作，因為有聲勢或當選機會的候選人不可能進行協調或放棄參選。如果再加上理念與策略上的不同，甚至於人際關係或情感上的仇視和指責，自然更容易形成內部不同陣營的分歧與對立（鄭祖邦 2019a: 143; Ma 2019: 142）。

（二）台灣反對運動的分歧：「政黨組織原則」的解釋

針對台灣反對運動內部分歧的現象，吳乃德〈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一文可以說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觀察。他認為：「大多數的社會運動都必須同時在兩條戰線上戰鬥。第一條戰線面對運動的敵人。另一條戰線則面對運動內部的同志，就不同的路線、目標或權力相互競爭」（吳乃德 1992: 77）。民主理論學者 Adam Przeworski（1991: 66-67）也說明了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這兩條戰線所內建的兩難：「為了實現民主，反威權的力量必須聯合起來對抗威權政體。但是，〔彼此之間〕為了在民主制下取得勝利，他們又必須彼此相互競爭。」吳乃德既是一位政治運動參與者也是學術研究者，十分關心從反對運動內部的鬥爭經驗（第二條戰線）來研究民進黨成立之後的未來走向（吳乃德 1992: 89）。對於如何解釋台灣反對運動所出現的分歧，他認為，在民進黨成立以前，反對勢力的內部分歧「主要是兩種組織原則的衝突和競爭」（吳乃德 1992: 94）。他運用 Angelo Panebianco 政黨研究的觀點，提出了在歐洲政黨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先後出現兩種組織原則，也就是從「群眾／官僚化政黨」轉變為「選舉／專業政黨」。⁵就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前者以特定階級為基礎，強調以街頭社會運動來連結群眾，後者則由公職人員主導，通過選舉活動來連結群眾。吳乃德（1992）將這樣的理解架構套用在 1980 年代台灣反

5 在 Duverger（1954: 63-67）的政黨研究中有類似的二分法：「幹部政黨」（cadre party）和「群眾政黨」（mass party）。此外，相較於將西方政黨理論套用到台灣經驗，林濁水則區分「公職人員」和「黨工」，兩者的關鍵差異在於是否以「理念掛帥」，公職人員強調「實力、利益」，黨工以「理念推動者」為期許（林濁水 1991: 11-13）。

對運動的脈絡中，歸結出兩點觀察：首先，「公職人員」和「黨工」分別代表了上述的兩種組織原則。其次，台灣反對運動階段的特殊性在於，「選舉／專業政黨」異常早熟地取得運動的領導權，而美麗島事件後黨工群體的出現對公職人員主導的路線提出了挑戰，各自不同但又同時存在的兩種政黨組織原則，造成了當時內部的分歧現象。

如果兩種政黨組織原則的並存，以及「選舉／專業政黨」異常早熟地出現，是台灣反對運動的特殊性，也是解釋內部分歧形成的重要因素。事實上，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香港反對運動的發展上。特別是從「泛民／本土」這組分歧形式來看，泛民政黨代表了「選舉／專業政黨」的組織原則，本土派則接近「群眾／官僚化政黨」的組織原則。泛民政黨如同台灣黨外的公職人員，長期以來主張以體制內的選舉來訴諸群眾推動香港的政改（全面普選），本土派卻強調以政治理念（香港獨立）和體制外的抗爭來動員群眾、尋求香港民主化的實現。兩種組織原則的觀點可以讓我們觀察到台港反對運動有著相近的分歧形式，但是，它似乎無法進一步去解釋，為何香港的內部分歧難以化解？台灣卻能進一步整合形成體制內的政黨？從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似乎需要更適當的解釋基礎。

（三）台港反對運動分歧的比較基礎：「國家性」的解釋

就台港比較研究而言，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何明修（Ho 2019: 8-10）*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挑戰北京的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以兩場 2014 年社會運動的比較來解答六個知識謎題（puzzles）。吳介民（2012: 136-137）則是在討論「台灣是否香港化」的議題時，提到了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的「國家性」（stateness）概念，以及對台港兩地民主運動發展差異的影響，不過文中並未進一步深究，僅是一種方向性的提示。Linz 和 Stepan 是比較民主化研究的重要學者，他們在 1996 年出版的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民主轉

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的第二章,同時討論到台港兩地民主化前景的問題。他們認為,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無論民主運動的範圍和力量有多大,都無法實現民主化。相對而言,台灣與中國是分裂但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可以在其中的一部分實現民主化(Linz and Stepan 1996: 18-19)。Linz 和 Stepan 此一推斷的基礎,正是建立在「國家性」這個概念之上。這個概念也凸顯了兩人在民主化研究上的特殊之處,一個關鍵的命題就是:「沒有國家,就不可能有現代民主」(Linz and Stepan 1996: 17)。當一個「政治單元的邊界」或「誰是成員」出現分歧,那就會產生所謂「國家性」的問題(Linz and Stepan 1996: 16)。我們可以說,國家性這個概念凸顯出當政治統一性(political unity)出現不確定與分歧的狀態時,就會對民主化的發展與結果產生影響。

Linz 和 Stepan 是從比較研究中觀察到,某些地區的民主化過程會凸顯國家性議題的重要性,例如相較於拉丁美洲和南歐的民主轉型過程,東歐和前蘇聯加盟國由於蘇聯解體後大規模的邊界重新劃分,使得邊界爭議和誰是成員等這些國家性和民族問題被凸顯出來,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小國(Linz and Stepan 1996: 28-29)。兩人還特別強調,我們不能僅將蘇聯視作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它更是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帝國(multiethnic empire),這個龐大的共產國家當初是建立在一些隱藏著衝突的原則之上,藉此維繫著帝國核心(俄國)與邊陲諸多的衛星國家,還有少數民族之間的聯繫(Linz and Stepan 1996: 369)。所以,蘇聯的瓦解不僅意味著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或集團的終結,更涉及到帝國的核心與邊陲之間關係的解組此一特殊的發展脈絡之上,並且使得東歐的第三波民主化與國家性議題相互牽連(鄭祖邦 2022: 50-51)。這點對於我們思考台灣和香港的民主發展頗有對照性與啟發意義。台灣和香港所經歷的不僅是脫離帝國控制的過程,兩者在脫離日本帝國/大英帝國(舊帝國)的殖民之後,還經歷被重新吸納入中華帝國(新帝國)的進程。近代中華帝國發展的特殊之處在於,清帝國瓦解之後並未分裂成不同的現代民族國家,接續的「中華

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力圖在單一政權底下維持著這個「多元一體的國家」。然而，清朝的領土擴張（蒙古、新疆、西藏等）所帶來的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亦即，如何真正團結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以及無法徹底消除的邊界問題，使得過去的清帝國和當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戰（鄭祖邦 2019b: 407-408）。事實上，台灣與香港從未參與過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將清帝國轉為現代中國」的建國歷程，一直到 1949 年中華民國「遷佔」台灣，199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香港，才讓兩地牽扯進近代中華帝國的歷史發展。隨著政權的更替，共產黨試圖以「一國兩制」來克服這個由帝國歷史堆積的國家性難題，國民黨則是試圖以威權體制將台灣中國化，來達成政治的統一性。因此，無論是台灣或香港的民主化，都必須放在這樣共通的歷史發展脈絡下，來加以檢視與比較。基於上述想法，筆者嘗試以「國家性」此一理論概念作為本文台港比較的基礎，進一步去論證不同的國家性狀態如何形塑兩者的民主化路徑與發展型態，進而對各自反對運動的內部分歧產生何種不同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是從比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的角度來出發，如同 Linz 和 Stepan（1996: XVI-XVII）指出：「比較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去發現和評估共同性和差異性的元素（elements of commonality and diversity）。」Charles C. Ragin（2014: 6）也同樣主張：「比較研究的興趣在於發現不同巨觀社會單元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藉此提供我們一把鑰匙，去理解、解釋與詮釋不同歷史結果和過程，以及對當前制度安排的重要性。」那麼，如何能對個案進行有效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比較？Ragin（2014: 19-20, 34）認為，面對個案的多樣性與複雜性，研究者可以將相似性與差異性整合至一個單一且連續的架構中，建構有用的經驗性類型學

(empirical typologies)，如此可以設定比較的邊界範圍，進而延伸對不同個案歷史發展軌跡的認識。從上述 Linz 和 Stepan 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到，在帝國擴張／解組的脈絡中對周邊地區所引發的國家性問題以及對民主化的影響。筆者因此試圖將「蘇聯帝國／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研究構想延伸到「中華帝國／台灣和香港」。不過，Linz 和 Stepan 對後者的思考是相當不足的，台港經驗僅被視作邊緣性的案例，突顯了兩人尚未充分發展「國家性」這個概念。台港的民主化發展都面對國家性的問題，而且兩地所面對的形勢和狀況有所不同，所以在研究架構上，筆者嘗試從台港不同的國家性狀態來建構有效的經驗類型，藉以進行兩者民主化發展路徑的比較分析。

我們可以利用政治邊界的歷史變動，來觀察台港兩地國家性變遷的差異（請參閱圖 1）。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祖國之姿對香港此一彈丸之地進行直接的吸納，而宣稱「中華民國」是正統中國的國民黨卻必須依附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才得以在國共內戰的體制下繼續存在。就國家性的角度來看，香港是在不民主的政體中試圖追求民主的一個政治次體系，台灣則是在想像的正統中國（中華民國）與實際的政治實體（台灣），兩者相互關係的調整過程中逐步取得相關的民主成果。從圖 1 下半部來看，香港在 1997 年由英國移交給中國之後，隨著中港之間不斷出現的政治與社會矛盾，讓政權和反對運動之間逐漸落入「中國國家性」與「香港國家性」的對抗脈絡。事實上，一國兩制的安排是為了維護中國領土完整這樣的政治需求，以及共產政權一黨統治的正當性，最終目的是讓香港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讓香港過渡成為一座中國的城市。相對來看，港人希望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通過民主的手段來追求香港自治。不過，一個非預期的結果是，在港人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激發出 Linz 和 Stepan 的國家性難題：誰是香港人？如何具備一個區隔於中國的共同體邊界？我們可以發現到，在回歸之後的民主運動中，香港主要的政治與社會矛盾都是環繞著與國家性相關的爭議而開展的（如：單程證、雙非兒童、反高鐵等）（鄭祖邦 2022: 59-70）。一國兩制的制度不僅無法達成中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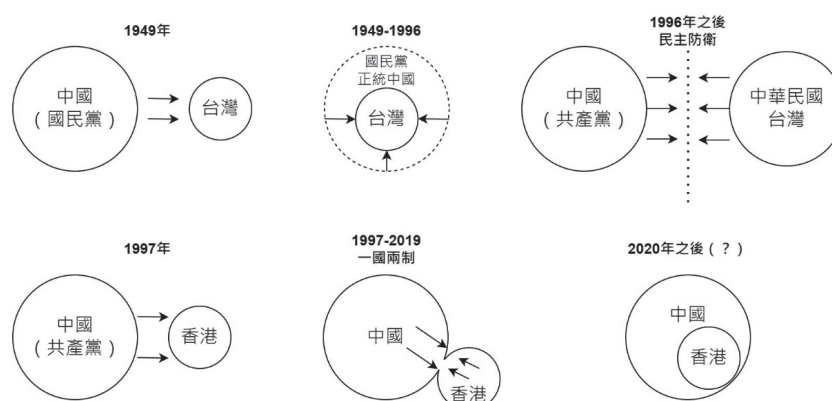


圖 1 台灣與香港國家性變遷示意圖

註：本文中的圖表皆由筆者繪製與整理。

間的政治一體性，反而成為一種政權鎮壓與民主抗爭之間不斷惡性循環的體制（鄭祖邦 2022: 58）。到了 2020 年國安法實施以後，中國對香港民主力量進行全面性的清洗與壓制，香港的未來是否會被完全吸納成為中國的一個內地城市，是有待持續觀察的方向。

相較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帶來了兩種國家性的衝突，圖 1 的上半部呈現台灣在 1970 年代面對「七二體制」，⁶ 開啟了若林正丈所謂的「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1949 年之後，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戰敗，然後以武裝集團的姿態遷佔台灣。由於國民黨能對正當暴力進行壟斷，治台初期以高壓強制的方式打壓了 1950 年代的民主運動，並在政府體制與意識形態各個面向上維持著對正統中國的宣稱與想像。這種對「正統中國的想像」與「台灣政治實體」之間的矛盾和不協調，一直到了 1970 年代美國的策略改變，對共產黨「一個中國」原則作出讓步，大大打擊了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迫使國民黨必須面

6 若林正丈提出所謂的「七二體制」，認為 1972 年尼克森訪問中國是一種歷史性的轉折，標誌著美國冷戰戰略的變化（拉攏中國對抗蘇聯）。這使得堅持作為「正統中國國家」的「中華民國」，其正當性開始受到此一國際秩序變化的挑戰，由《上海公報》、《臺灣關係法》、《八一七公報》共同構成環繞「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國際體制（若林正丈 2016: 122-134）。

對中華民國與台灣不一致這個國家性的問題。當時正要繼任的蔣經國，為了避免統治集團選擇向共產黨投降（祖國和平統一），並保持台灣的「中國國家體制」，進行了政治體制的局部調整。其中，國會部分定期改選更打開了本土反對運動的政治空間，反對人士得以突破個人化的經營與地方性侷限，形成全國性的反對陣營（湯志傑 2006: 154, 2007: 91），從而有機會透過選舉和問政觸及國家性的問題。當遷佔者國家逐漸被迫必須面對台灣社會，此即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啟動，並且，一旦開始往緩解的方向調整，便會造成無可停止的持續動能（若林正丈 2016: 122）。從黨外到 1986 年民進黨成立，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 年首次總統全民直選，都是台灣重要的民主里程碑。總統直選標誌著國民黨所宣稱的中華民國與台灣這個政治實體進一步達成一致性的時刻，儘管尚欠缺完整的主權地位，但是透過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全體住民對自身的政治邊界與身分認同得到有效的確認。此外，1996 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也讓中國因素開始進入了台灣日常的政治（吳介民、李丁讚 2008: 40），使得台灣國家性的狀態進入新的階段，從原本國、民兩黨為主的內部政治對立，轉變成民主台灣與極權中國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邊界上，不斷進行著共產中國與中華民國台灣之間的國家性對抗。

根據上述的討論，筆者將台港國家性所呈現的內在邏輯進一步類型化，香港的「一國兩制」形成持續「對峙型」（antagonist type）的國家性狀態，而「中華民國台灣化」代表趨於「一致型」（convergent type）的國家性狀態。在「對峙型」的國家性狀態下，抗爭者與政權之間進入難以妥協的「鎮壓／抗爭」的螺旋機制（repression/contention spiral mechanism）之中。⁷而在「一致型」的國家性狀態下，國民黨政權為尋求正當性，有意或被迫去擴大體制內的政治空間，讓反對運動得以進入體制，展開政黨政治的競爭循環。

7 Alimi, Bosi and Demetriou (2012: 10) 提出「機會／威脅」的螺旋（opportunity/threat spiral）作為比較不同社會運動激進化的機制，筆者延伸此一構想，提出在對峙型國家性中會出現「鎮壓／抗爭」的螺旋機制，並呼應本文對台港激進化程度的比較。

筆者將在第四節與第五節中說明台灣和香港反對運動的內部分歧，闡明不同國家性類型與民主化路徑差異（民進黨／無大台）的因果關連性，進而在第六節對台港兩地政治分歧內容進行具體的比較分析，釐清雙方在「激進化」與「組織化」這些發展型態上的相似與差異。「激進化」想要了解的是，在反對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行動者或團體在運動目標和行動策略上的激進化程度。「組織化」則是從反對運動的凝聚機制（cohesion mechanism），來觀察運動內部的組織化程度與整合方向（向心力或離心力），其中包括了「動員媒介」（黨外雜誌／科技網路）、「選舉平台」（黨外助選團／雷動計畫）的比較。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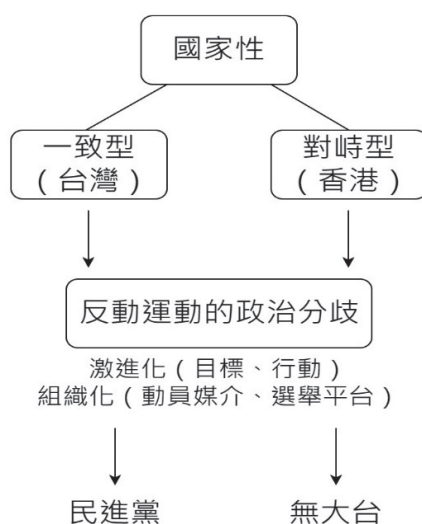


圖 2 研究架構圖

最後，針對本文的分析，筆者進行多面向的資料收集。除了參照既有研究的成果與觀點，台灣在 1970 至 1980 年代出版眾多的黨外雜誌，以及宜蘭慈林文教基金會的完整館藏，是筆者理解當時政治分歧重要的資料來源。此外，輔以書籍、口述史、傳記等相關材料來進行必要的補充。香港的相關分析主要仰賴筆者於 2016 至 2019 年，在

香港所進行的田野觀察、文獻收集以及深度訪談資料。在訪談部分，共引用 4 場深度訪談資料，受訪對象包括政黨核心幹部、社運活躍分子、大學學生會核心成員等（請參見附錄 1）。在田野觀察部分，來自三次參與六四維園紀念晚會（2016 年、2018 年、2019 年）及其他相關紀念活動，並多次至選舉與社會運動場合進行實地觀察。

四、台灣反對運動中的分歧現象

就台灣戰後民主運動發展來看，1950 年代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中心的政治反對活動，隨著雷震的被捕而瓦解。之後反對人士不再有集結的企圖，只能零星散落在地方政治與地方議會（特別是省議會），成為受到體制壓制的「忠誠反對派」。一直到 1970 年代反對勢力才再度集結，相較於《自由中國》時期的反對人士以外省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本土政治菁英形成反對勢力的要角。黃信介、康寧祥等人在 1975 年共同創辦《台灣政論》月刊，可以算是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濫觴（杭之 1990: 47）。不過，在民進黨正式組黨成立之前，反對運動陣營中曾出現過許多運動策略與路線上的分歧。基本上，從 1977 年中壢事件到 1986 年民進黨創立之間，先後浮現出三組主要的分歧：「議會路線／群眾路線」、「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雞兔同籠問題」（請參考表 1）。

表 1 台灣反對運動分歧狀況

| 分歧的議題 | 溫和派 | 激進派 |
|------------|-----------------------|---------------|
| 議會路線／群眾路線 | 康寧祥《八十年代》 | 黃信介《美麗島》 |
| 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 | 康寧祥系統（公職人員） 《八十年代》 | 黨外新生代（黨工）《深根》 |
| 雞兔同籠 | 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 | 編聯會《新潮流》 |

在 1977 年中壢事件的警民衝突之後，部分黨外人士感受到群眾的力量，開始轉向街頭發展而不只是傳統的議會選舉路線，導致反對

運動出現路線歧異，只是影響尚屬有限，未形成壁壘分明的局面（黃德福 1992: 74）。在 1978 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前，因康寧祥對反對運動的擴展持保守態度，就隱然出現「康寧祥」和「非康寧祥」兩個系統（新台灣研究文化基金會 1999b: 66-67）。其後因台美斷交，國民黨停止選舉，反對運動陣營的緊張性加劇。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康寧祥找江春男擔任《八十年代》總編輯（1979 年 6 月創刊），並組織「黨外候選人聯誼會」（1979 年 6 月 2 日）來整合黨外力量。後來施明德等「五人小組」找了黃信介籌辦《美麗島》雜誌（1979 年 8 月創刊），不僅定位於編輯團體，更要形成「美麗島政團」，成為一個政黨。兩個刊物的創刊剛好代表黨外內部路線的不同，康寧祥偏向議會路線，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不認同立即組織化（組黨）的作法。《美麗島》則是走組織化形成黨外總部，在各地成立分社，建立全島性的組織並爭取群眾基礎（新台灣研究文化基金會 1999b: 211, 237；楊旭聲 1983: 60-61；包斯文 1980: 78-79；艾琳達 1998: 153-156）。1979 年先後創刊的《八十年代》和《美麗島》雜誌，就展現出「議會路線」和「群眾路線」的不同主張。

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政府大舉搜捕黨外人士，群眾街頭路線的陣營一時潰散，而秉持溫和議會路線的康寧祥等黨外人士受到較小的影響，成為當時政治寒流中的黨外主流。在 1981 年 11 月地方公職選舉時，這些劫後的黨外以「制衡」作為主題，「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黨外、制衡、進步」成為候選人的主要競選標語。但是，美麗島事件後七〇年代的反對運動領導階層於短時間內退隱，讓原本扮演「黨工」角色的黨外新生代有機會浮上檯面，提早站到第一線。美麗島事件引發了他們對過去反對運動選舉路線的反省，因為美麗島的潰敗證明了國民黨不容許有限度的改革，反對運動應該要去「改革體制」（吳乃德 1992: 85-86）。黨外新生代不願再扮演七〇年代忠誠反對者的角色，願意採取更激烈的政治訴求（王甫昌 1996: 168-169）。邱義仁就為文指出：

經歷「美麗島」事件的慘痛教訓之後，實在有必要深切地檢討運動發展的路線問題。此一問題的檢討，也不是可以關起門來私下溝通了事的。當年「美麗島」與「八十年代」的路線之爭，就是因為沒能公開檢討，而使得群眾的判斷與選擇，經常是以其個人的情感好惡來做選擇。⁸

因此，黨外新生代開始「公開」挑戰康寧祥代表的路線，高呼「戰鬥才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⁹造成後來以「公職掛帥者」和「黨工」之間的分歧。在 1982 年時，以《深耕》雜誌為基地的新生代開始對康寧祥領導的黨外主流力量在運動路線上提出質疑，而後演變成「批康」、「倒康」的行動。¹⁰從同年 5 月份的「杯葛放水事件」（黨外立委放棄杯葛警備總部預算案），¹¹8 月份《深耕》雜誌主辦的座談會上，時任台北市議員的謝長廷肯定制衡路線，黨外要與海外台獨劃清界限進行制度內改革的發言，引起了「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的爭論。¹²隔年（1983 年）為因應年底的增額立委選舉，開始草擬組織「黨外後援會」。但是，黨外新生代對於由上而下產生候選人的「推薦制度」有所異議，主張應該以民主的方式產生候選人，反對

8 張明雄（邱義仁）〈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9 李敖在 1982 年 8 月寫了一篇批評康寧祥背叛選民的文章〈戰鬥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原本要發表在《深耕》雜誌，但是被林正杰抽掉，沒有刊登出來（蔡盛琦 2008: 177）。

10 當年輕世代的黨工浮上檯面後，康寧祥就成為「保守」的一方。不過，在 1970 年代，康寧祥在萬華以台語進行街頭演說，強烈批判國民黨，吸引了許多大學生成為黨外日後的支持者和推手（新台灣研究文化基金會 1999a: 174）。康寧祥這種「啟蒙者」的角色，很類似於香港社民連黃毓民的網台節目〈論政平台〉對當時年輕一代的政治啟發。

11 《深耕》雜誌第 11 期（1982 年 6 月 10 日）刊出「放棄杯葛，黨外還有什麼」專題，收錄多篇批判性的文章，如王麗美〈杯葛鬧劇始末記〉，李敖〈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張明雄（邱義仁）〈批判黨外，刻不容緩：抗議黨外杯葛立法院會的虎頭蛇尾〉。

12 《深耕》雜誌第 16 期（1982 年 8 月 25 日）刊出林正杰〈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張明雄〈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刊出張明雄〈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第 19 期（1982 年 10 月 10 日）刊出張明雄〈改革體制與制衡神話：敬答謝長廷議員〉。謝長廷則是在第 18 期發表〈現階段黨外制衡路線的困境與突破〉，對「改革體制」的觀點進行批判。

提名上保障現任立委，對黨外既有的權力結構的運作方式提出質疑。連番的「放水」批判、體制內／外的改革、後援會提名的爭議，最終導致了原屬黨外主流派的康寧祥、張德銘和黃煌雄在年底的選戰中落選，也讓當時的路線爭議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到了 1984 年，黨外新生代成立《新潮流》雜誌社，掀起「雞兔應否同籠」的問題，使得上述爭議從《深耕》延續到《新潮流》雜誌。在發刊詞〈重建新的反對事業〉中，就嚴厲批判了以公職掛帥、山頭主義為主導的黨外運動，選舉／議會路線無法觸及政治問題的癥結，議會公職菁英極易妥協、軟化、喪失理想主義，山頭主義也阻塞了更多志士仁人的獻身之路。他們主張要「打破框框、樹立新規範，另起爐灶，從頭幹起」。這樣的發刊詞可以視為自 1975 年以來黨外民主運動路線的質疑與批判（杭之 1990: 51）。為了「重新建立反對運動的事業」，黨外新生代所組織的編聯會在同年 6 月 7 日舉辦「雞兔問題座談會」，挑起「雞兔同籠問題」之辯論，¹³ 凸顯出黨外兩種不同的政治動員方式與政黨組織原則（吳乃德 1992: 92；杭之 1990: 45, 50）。嚴格來說，雞兔同籠問題已經不純粹屬於分歧問題，反而是在面對當時的組黨議題時思考要「聯合誰、對抗誰」、「要組織怎樣的政黨」這類的問題。例如，《新潮流》第 19 期明確指出刊物的想法：「黨外運動發展到某一階段，分化是必然的。必須通過分化的考驗，才能使各人明瞭自己的角色，認識自己的權利義務，成為黨外組織的一環。」¹⁴ 黨外新生代想要思考的是，面對強大的政權如何組織一個具有理念與紀律的「政黨」，而不是因一時利益而鬆散結合的「黨外」。除了利益與權力的競爭之外，或許也是在路線鬥爭中思考

13 吳乃德在《新潮流》第 17 期（1984 年 10 月 2 日）發表的〈雞兔難題的難題：一個臨時的討論架構〉一文中，對當時的「雞／兔」概念作出界定：所謂「雞」是政治行動的目標在改革或反抗整個體制，改變或反抗基本政治（或經濟）結構的黨外，用西洋的術語來說就是「反對派」（the opposition）；所謂「兔」是不屬於國民黨權力系統的一分子，且政治行動並不以改變或反抗基本政治結構為目標，用西洋術語來說就是「獨立派」（the independent），或「半反對派」（the semi-opposition）。

14 〈本社，我們對雞兔難題的立場與態度〉，《新潮流》第 19 期（1984 年 10 月 16 日）。

團結議題，「一個黨外新生力量內部凝聚共識的過程，但同時也是逐步排除『行動溫和』或『信仰不堅』的他者的過程」（吳介民 2002: 175）。

五、香港反對運動中的分歧現象

香港的民主化始於英國殖民統治的後期，1970 年代出現所謂「諮詢式民主」，通過專業菁英的有限度公民參與。在 1979 年，時任港督的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為面對即將到來的中英兩國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開始強化政府諮詢架構，並在地區推行代議政治引入民選議員。區議會在 1982 年進行首次選舉，這也是香港市民第一次能夠參與的直接選舉。這些區議員透過辦事處的成立與相關津貼成為爭取市民支持的據點，並發展為政治團體。這些原本屬於改革派的社區工作者與政治團體，在 1980 年代中整合為民主派，¹⁵ 成為香港傳統民主黨派的運作基礎。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下，刺激港人更進一步的民主要求（So 1997: 51-53），最終中英談判同意在 1991 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由 10 席增至 18 席，功能組別由 14 席增至 21 席。香港民主派於 1990 年 4 月 2 日成立「香港民主同盟」備戰 1991 年立法會選舉，最終以民主抗共論贏得 16 席。其後面對民主派高漲的聲勢，1991 年 7 月 10 日支持北京政府的建制派政黨「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成立。「香港民主同盟」在 1994 年 10 月 2 日與「匯點」合併為「民主黨」，在隔年選舉中贏得 17 席（共 20 席）直選議席。不過，此種不完全且有限的民主體制，使得香港回歸後最重要的政改議題就是實現「特區行政長官直選」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在《基本法》附件中的直選規定，成為回歸後一直到雨傘運

15 為了抵制香港親中商人與北京政府合謀、妨礙香港民主發展的《基本法》，改革派發起爭取民主體制的社會運動，91 個改革派團體於 1986 年 10 月 27 日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成員自稱「民主派」，領導人為司徒華和李柱銘，以爭取 1988 年立法局引入直選為短期目標。

動前，香港民主發展的主要課題，泛民政黨以「政改」為核心經營選舉和議會協商為主的抗爭路線（徐承恩 2017: 389-449；馬嶽 2012: 1-53；So 1999: 87-152）。

傳統泛民陣營在 2006 年開始出現內部分化的現象，隨著民主黨的衰落和泛民陣營的內鬨，一群大律師和專業人士組織了「公民黨」（Civic Party），同年另一群激進的民主派人士則成立「社會民主連線」（簡稱「社民連」，the 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¹⁶ 公民黨與民主黨算是同一陣線，兩者之間的一大分別是民主黨背負「民主回歸」的民族使命，公民黨則是希望以《基本法》作起點建立法治民主。不過，兩者共同堅守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有別於主張激烈問政路線的社民連（吳靄儀 2018: 189）。前者可稱為「溫和泛民」，後者可稱為「激進泛民」。相較於傳統泛民政黨，社民連的領袖黃毓民和梁國雄（外號「長毛」）改變了泛民政黨和理非非的議會問政風格，而「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的政黨精神也獲得年輕選民的認同，在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獲得成功。不過，社民連到了 2011 年也發生分裂，黃毓民連同 200 多名黨員退黨，另外成立「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試圖採取更激進的策略（癱瘓議事或佔領活動）來迫使政府進行政改，希望藉此來與傳統泛民政黨進行區隔，顯示出當時改變中的香港政治文化。

如果將公民黨和社民連的創立視為是泛民政黨的「內部分歧」，對香港反對運動最為關鍵的「外部分歧」，可以說是伴隨著「本土派」興起而出現的「泛民／本土」之間的對立。泛民陣營的主要論述基礎之一就是民主回歸論，強調以「民族」的原則來體現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愛國情操），再以「民主」的方式來捍衛香港的一國兩制

16 事實上，在公民黨和社民連自民主陣營分化之前，民主黨內部就因社會政策（最低工資）、大佬文化等問題，一直隱然存在溫和與激進、議會路線和街頭路線的分歧，內部少壯派議員倡議黨內民主，試圖結合議會與街頭運動路線的策略。數十位少壯派的民主黨成員在 2002 年宣布退黨，加入另一民主派政黨「前線」。不過，在 2008 年時，前線召集人劉慧卿連同 9 名執委加入民主黨，試圖合併兩個政黨，凸顯了環繞民主黨本身複雜的分與合（何俊仁 2010: 100, 103-108）。

(Ma 2015: 51)。民主回歸論者相信，只要回歸後香港能落實民主的實踐，最終就能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正是在這樣的論述框架下，泛民陣營主要的運動策略就是議會一選舉路線，在一國兩制的體制內進行有限度的挑戰。然而，這樣的論述遭受到被支持者稱為「港獨之父」陳雲的攻擊。陳雲（2011）在《香港城邦論》一書中，將反對運動中的本土政治意識和本土派的政治立場提升到完整論述的層次（孔誥烽 2022: 224）。儘管書中許多的論證和內容引起了不少的爭議，但是，他對「中港區隔」和「勇武抗爭」的主張，使得「本土／泛民」、「左翼／右翼」等相關的分歧逐漸浮現成為公眾議題。城邦論在行動面向上強調「中港區隔」（人口、族群、地理界線上的區隔），並且在抗爭上採取所謂的「勇武抗爭」（如：驅趕中國水貨客），以此批判泛民「和理非非」的民主運動傳統（如：七一遊行、六四維園晚會）。這是一種「維穩社運」，關鍵的時候只會解散群眾（散水），行動永遠不會升級，難以真正達成抗爭訴求。這些論述方向和行動模式在香港社會都引起了許多爭議和討論，乃至於引發了本土論述中所謂的「左右之爭」。陳雲（2015）從本土政治與族群鬥爭的立場痛批了擁抱平等、人權和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左翼社運論者，批評他們不夠勇武，只是離地賣港賊，並且為這些左翼論者貼上「左膠」的標籤，視他們為包庇中國人侵擾、破壞香港社會的幫兇。總體而言，城邦論引發的左右之爭使得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從對外抵抗中國的霸權論述，變成內部的鬥爭與矛盾。正如一位本土派的支持者就說：「本來沒有什麼本土派，只是一群反對泛民的人，沒有泛民的話，沒有本土派」（訪談編號 HK180101）。「本土／泛民」、「左翼／右翼」這些分歧內容，可以說重塑了香港的政黨體系。

中國人大常委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以「831 框架（決定）」否定香港 2017 年的普選，不但引爆了雨傘運動，也讓民主回歸論所支撐的傳統抗爭策略和運動模式受到質疑，這不斷「被拖延的民主」（protracted democracy）（Lo 2015: 27; Ma 2019: 145）似乎走到了盡頭。然而，儘管經歷了泛民路線的崩解、雨傘運動的「挫敗」，各

新興陣營仍試圖透過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宣傳自身的政治理念以取得政治影響力。首先，黃毓民離開人民力量之後成立「普羅政治學苑」，其後與「熱血公民」、和「香港復興會」（陳雲）共組本土派的參選聯盟「熱普城」。¹⁷ 其次，在 2016 年旺角衝突之後，本民前候選人梁天琦遭受拘捕、起訴，進而聲名大噪。經此一役，本民前的衝突行動讓原先僅在陳雲書中的勇武抗爭得到了具體的發展和挪用（李祖喬 2018: 214），吸引了許多對現狀不滿的年輕選民，團體的支持度大幅上升。最後，學民思潮和前學聯的成員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組成新政黨「香港眾志」（DEMOSISTO），並且與原先的左翼社運的力量整合起來形成所謂的「自決派」（民主自決），與本民前的「民族自決」主張形成對立。在「民主自決」的旗幟下吸納了過去本土左翼所強調的若干元素（如：反地產霸權）與抗爭經驗（如：本土保育運動），並將左翼社運整合進入香港前途問題（涉及香港政治共同體的想像）。他們強調民主的群眾參與和非暴力抗爭，都與本土派（右翼）劃定身分邊界的民族主義和勇武的行動策略形成區隔。香港民主政黨的主要演變情況，請參閱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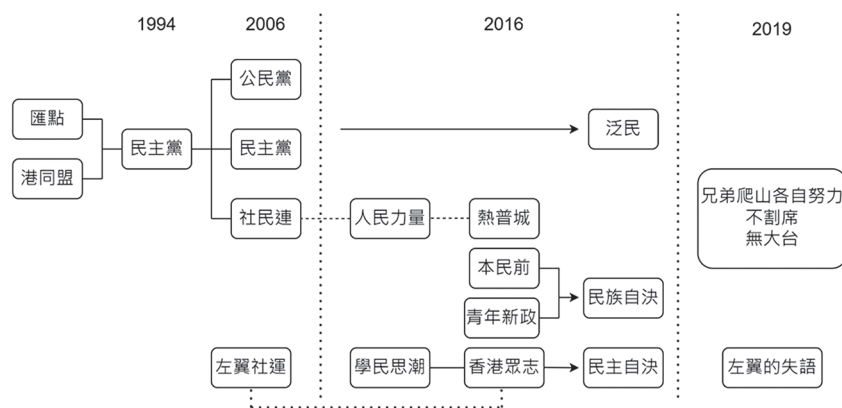


圖 3 香港民主政黨變遷圖

17 黃毓民（2016）主張「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他並未完全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構想，認為只是一國兩制的延續。相關主張的分歧是這個聯盟在選後瓦解的因素之一。

六、台港反對運動中分歧現象的比較與分析

從國家性的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當一個存在國家性問題的地區開始追求民主化之後，本土化的議題很容易隨之出現。在台港兩地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廢除臨時條款／全面普選）也都出現了本土化的訴求（台灣獨立／香港獨立）。鄭敦仁與徐永明認為，在民進黨成立以前，反對陣營與政權的政治分歧在於「民主／威權」，民進黨成立之後「統／獨」開始逐漸成為主要的政治分歧。他們稱前者為「民主化」的議題架構（issue structure），後者是「本土化」的議題架構，不同的議題架構會影響政黨之間／之內勢力的重組，以及在選舉時的政治動員（Cheng and Hsu 1996: 139）。這兩個議題架構正是吳乃德所謂的「第一條戰線」，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條戰線的內部分歧會受到第一條戰線變化的影響，這是吳乃德僅從政黨組織原則的角度而未能加以強調的。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同樣出現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議題架構，只是兩地國家性狀態的差異使得外部的議題架構（第一條戰線）對內部的政治分歧（第二條戰線）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如圖 4 上半部所示，以民進黨的成立（1986 年）為分界，在與威權政體抗爭的第一條戰線（I），就是從「威權／民主」走向「統一／獨立」的議題架構。前者以民主化的訴求為主，後者本土化的議題浮上檯面。在訴求民主化的階段，反對運動陣營主要的內部分歧（第二條戰線）（II）在於抗爭的手段（體制內／體制外）。圖 4 下半部，香港在 1997 年回歸之後，到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主要的訴求也是民主化，特別是以民主回歸作為民主運動的論述核心。這個階段主要的內部分歧就是「溫和泛民／激進泛民」，亦即面對政權抗爭手段上的差異，可以說與台灣反對黨成立前相當近似。然而，在雨傘運動之後政改無望、民主回歸論破滅，香港獨立成為年輕世代推動民主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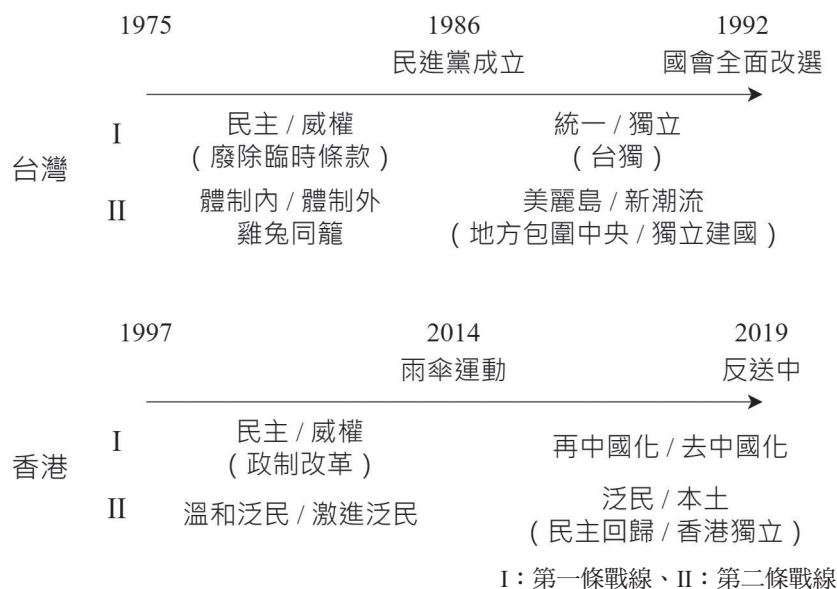


圖 4 台港議題架構與內部分歧的演化

主要論述，本土化議題浮上檯面。在第一條戰線與政權形成「再中國化／去中國化」的議題架構，第二條戰線則相應本土化的議題架構形成「泛民／本土」的內部分歧。由此來看，儘管台港都歷經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展歷程，但是兩者關鍵的差異在於，台灣的本土化是在民進黨成立（反對運動進入體制）之後才成為具主導性的議題架構，而「統／獨」是國民黨與民進黨選舉競爭上的對立（第一條戰線），並未在民進黨內部形成主要的分歧。相較而言，本土化的議題架構（民主回歸／香港獨立）卻形成香港內部（第二條戰線）的嚴重分歧。此外，除了民主化與本土化演變過程中所帶來的外部議題架構與內部分歧內容的變化之外，台灣在組黨前夕出現了「雞兔同籠」的內部分歧，但此種分歧本質上是團結的議題，這是香港反對運動中從沒有出現過的分歧內容。接下來嘗試從台港外部議題架構與內部分歧的比較中，來討論兩地在運動發展型態上的「激進化程度」和「組織化程度」之差異，並透過不同的「國家性狀態」作為解釋因素，提出進一步分析的可能性。

（一）台港反對運動發展型態的差異（I）：激進化程度

儘管反對運動內部的分歧方式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變化，大體上都可以在「溫和／激進」（moderates/radicals）的大框架下來理解，或者說內部分歧的主軸就是激進路線對既有溫和路線的挑戰。無論是台灣或香港，在整體的分歧形態上都是既有的溫和路線受到新興的激進路線的挑戰。基本上，反對運動中的分歧正是對運動的路線與方向發生了爭議，不同的運動者對所欲達成的「運動目標」和「行動策略」有著不同的主張，我們可以從這兩個面向進一步來比較台港兩地溫和派和激進派的分歧內容（請參考表 2）。在台灣，反對運動的主要「運動目標」在於推動「民主改革（化）」（廢除「臨時條款」實現民主憲政），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沒有太大的分歧。¹⁸ 當時民主化議題具有整合性，能跨越不同的族群界線和意識形態的光譜，並以對抗國民黨這個政權為核心。然而，香港泛民政黨與本土派之間在反對運動的目標上卻相當不一致。在民主黨的創黨時期，創黨元老司徒華（2011: 246-247）就強調：「現在回歸到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使我和國內同胞有機會共同爭取一個民主的中國。」這種「建設民主中國」的目標與本民前主張「香港獨立」，可以說是政治光譜上難以共容的兩個端點。香港反對運動中的「民主回歸／香港獨立」可以說就是台灣「統／獨」的議題架構，關鍵的差別在於香港在反對運動的階段就已經存在內部的政治分歧，也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銜接點與台灣是不同的。台灣是在 1980 年代才慢慢浮上檯面，特別是民進黨成立之後，作為一個本土政黨省籍統獨才開始成為選舉動員和政治對立的主要形式。在反對運動的發展階段，這是一個較為隱匿且未完全浮上檯面的爭議焦點，當時最多以「省籍不公」這樣的形式出現。康寧祥（2013: 320）在回憶錄中談到支持黨外的外省籍立委費希平時說：

18 在當時的批康風潮以及「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的爭議中，康寧祥曾在〈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一文中提到，「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只是字面之爭，「改革體制」是要改革戡亂臨時體制，「體制內改革」是要在憲政體制之內從事改革，這兩者有差別嗎？（康寧祥 1983: 145-146）

「1981年的黨外，省籍、統獨的矛盾還沒有明顯，民主是大家共同的目標。」在「行動策略」的面向上，台港兩地激進派對溫和派的批判，兩者之間具有相似性。例如，台港溫和派的議事手段都受到質疑，香港溫和泛民和激進泛民就呈現出「理性問政 vs. 拉布、罵戰」的不同風格，台灣黨外也出現在議事上「放水 vs. 杯葛」的爭議，其後進一步上升到「體制內／體制外」的改革之爭。台灣年輕黨工「改革體制」的主張可以對照香港年輕世代的「勇武抗爭」，香港本土派批判泛民都是「體制內的有限度抗爭」、「抗爭不升級」，台灣年輕黨工則批判公職溫和派「妥協／放水／掛勾路線」。台灣的激進派強調「改革體制才有體制內的改革」，香港的本土派則強調「抗爭無底線」。當年林正杰在《深耕》雜誌 16 期對「體制內改革」的批判：「等待國民黨來誇獎『理性』、『溫和』，來頒發乖寶寶獎章是黨外的自我矮化和自暴自棄。」¹⁹ 可以說與香港本土派對泛民政黨和理非非的批判相當近似。

表 2 台港反對運動分歧內容對照

| | | 溫和 | 激進 |
|------|----|-------------|-------------|
| 運動目標 | 台灣 | 廢除臨時條款（民主化） | 廢除臨時條款（民主化） |
| | 香港 | 建設民主中國（民主化） | 香港獨立（本土化） |
| 行動策略 | 台灣 | 議會制衡（體制內） | 改革體制（體制外） |
| | 香港 | 和理非非（體制內） | 勇武抗爭（體制外） |

在香港的反對運動中，「民主回歸／香港獨立」的議題架構核心涉及到政治身分（中國人／香港人）與統獨分歧（回歸中國／香港獨立），這正是陳雲「中港區隔」的主張所涉及的「國家性」問題。只要追求的是「香港的」民主，那麼「香港的邊界」、「誰是香港人」就會成為反對運動的基本難題，「民主化」與「本土化」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不過，在對峙型的國家性狀態中，中港之間的政治

19 〈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深耕》雜誌第 16 期（1982 年 8 月 25 日）。

與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政權鎮壓與民主抗爭的惡性螺旋機制使得政治空間不斷緊縮，持續黯淡的民主前景更讓泛民和本土派不僅在行動策略上相互指責，也對眼下的危機充滿急迫感以及對未來的無力感。在泛民政黨無法有效回應政權的壓迫時，年輕世代形成「和平抗爭無用論」的氛圍，不利於反對陣營的凝聚，導致內部分歧出現更為極化（polarization）和碎裂化（fragmentation）的現象（Ma 2019: 139; Van de Walle 2006: 88）。「香港獨立」的主張迅速出現在在反對運動的公開議程上，無論是行動策略或運動目標都走向激進化。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立法會競選階段，香港眾志為了動員群眾回應國家性的議題，提出「民主自決」此種相對溫和的主張，但都不被本土派認同。一位本土派政黨領袖受訪時說：「我不同意他們講的。三個東西，中國的城市、一國兩制、〔香港〕獨立，你不支持獨立，那你支持〔成為〕中國城市嗎？如果不是的話，你繞一個大圈回來說我們還是支持一國兩制」（訪談編號 HK180101）。相較而言，在台灣的反對運動從民主化推向本土化的過程中，「民主自決」的立場是被接受的共同主張。在 1983 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黨外候選人共同推出的一個口號是「民主、自決、救台灣」，而黨外中央後援會的共同政見第一條是：「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的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雖然有少部分候選人因執政當局對於「自決」兩字敏感而予以刪除（如：康寧祥），或將「自決」改為「自覺」（李筱峰 1987: 192），仍是政見台上候選人大力談論的主題，並未在內部形成主要的分歧。事實上，早在 1977 年，台灣長老教會在面對台美外交關係轉變之際，發表〈人權宣言〉時就率先提出：「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隨後，1978 年底美中宣布建交，國民黨停止選舉活動。在這備感存亡危急的時刻，黨外人士發表〈國是聲明〉，在結尾中提出：「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決定」（周琇環、陳世宏 2000: 169）。這是黨外第一次出現隱含台獨主張，排除中國決定台灣命運的文字，開始以民主的原則來包裝台灣的認同。不過，該聲明不僅

康寧祥，當時黨外的統派陳鼓應、蘇慶黎都沒有簽名（新台灣研究文化基金會 1999b: 110）。根據張俊雄的說法：「簽署那份〈國是聲明〉時，我還沒有考慮到會為了這樣而分裂。黨外陣營早就有意識形態的爭論，但是還沒有到會因內爭而分裂的局面」（新台灣研究文化基金會 1999b: 190）。更進一步來看，民進黨建黨之後，「反對運動該如何與威權交鋒」再度成為黨內路線辯論的主題（蘇彥圖 2021: 207）。當時黨內美麗島系著重於如何透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地方包圍中央），新潮流系則提出要強化獨立建國的台獨理念（陳芳明 1989: 270-271）。在黨內出現台獨主張之際，1987 年鄭南榕公開演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更是一舉衝破威權體制下長年禁止台獨議題的政治禁忌。²⁰ 鄭敦仁和徐永明認為，在 1986 年以前民主化是主導的議題架構，民進黨成立之後，儘管統獨議題引起了黨內派系的鬥爭和辯論，但是當 1991 年台獨黨綱獲得共識之後，反而讓民進黨內部獲得進一步的凝聚。相對而言，統獨議題卻造成了國民黨的分裂危機，特別是新黨的出現（Cheng and Hsu 1996: 148-152）。到了 1992 年國會進行全面改選，更增添了反對黨在選舉競爭上的動能，省籍、族群成為兩黨重要的選舉動員方式，「統／獨」取代「民主／威權」成為主導外部競爭的議題架構。²¹

總體而言，無論是台灣或香港，在美麗島事件和雨傘運動之後都面對了反對運動進一步激進化的現象，特別是本土化訴求從潛藏伏流開始浮上檯面。然而，不同的國家性狀態影響了反對運動的激進化程度，乃至於內部分歧的內容。在尋求一致型的國家性狀態中，台

20 台港反對運動所處的自由化發展方向是近乎顛倒的，以言論自由來看，台灣在戒嚴時代的法律箝制下，完全沒有言論與思想自由的空間。而香港回歸之後，在一國兩制下保有英國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相當程度法治與政治自由化空間，讓不同的政治言論比較容易浮上檯面並互相競逐。

21 審查人提醒台灣在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之後，反對運動陣營並非是團結的，仍有大大小小的分裂現象（工黨、勞動黨、綠黨、建國黨等）。不過，本文並非去比較「所有的分歧」，無論多麼團結的歷史情境一定還是可以發現到個人甚至小團體的分裂現象。對一個比較研究而言，筆者是依據本文關心的問題意識來進行比較材料的選擇，而非所有的歷史細節。本文關注的是，在相關的問題意識下什麼才是對反對運動的發展具有主導作用的現象，例如：香港「泛民／本土」的分歧、台灣「黨外→民進黨」。

灣反對陣營在「正統中國的想像」與「台灣政治實體」的國家性矛盾中推動民主化。1970 年代初期，國民黨試圖在「中華民國體制」下進行有限的民主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不僅無法充分面對外部正當性的壓力，也無法說服已經覺醒而回歸現實的世代。儘管政權選擇了對美麗島事件進行暴力鎮壓，卻無法改變地緣政治變化所暴露的國家性矛盾，向下尋求正當性的國民黨在維護政權存續下必須「讓自己民主化」（democratize itself）（Cheng 1989: 495）。黨外力量把握住有限的民主空間（競爭性的選舉），持續挑戰在正統中國與台灣實體之間蓄積已久的體制性矛盾，迫使國民黨對逐漸組織化且獲得社會支持的反對運動做出讓步與妥協，正統中國無可避免地在民主化過程中持續弱化直到兩者達成一致性。相較而言，在對峙型的國家性狀態下，讓香港反對陣營在雨傘運動過後開始遭遇日益強烈的政權壓制。在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時，以取消資格（DQ）剝奪港人的參選權與參政權。在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的催化下，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反對陣營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勝，民主派人士紛紛投入隔年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但多人遭到 DQ 除名，港府更以疫情為由停辦選舉。乃至 2020 年 6 月，國安法實施全面搜捕反對派人士，最終頒布「完善選舉辦法」，終結了香港僅存的有限民主體制。

（二）台港反對運動發展型態的差異（II）：組織化程度

Robert A. Dahl (1966: 332-335) 曾在反對（派）型態（patterns of opposition）的相關研究中指出，組織的「凝聚力或集中性」（cohesion or concentration）是影響反對派政治競爭力的重要面向：反對派愈集中於單一政黨凝聚程度愈高，若分散於不同的政黨組織則凝聚力較低。基本上，增強反對運動的集中性（向心力），可視為反對黨組織結構制度化的第一步（黃德福 1992: 38）。如果再借用涂爾幹「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的概念來類比，筆者認為香港反對運動的型態是一種「片段的」（segmental）模式，而台灣反對運動屬於「有機的」（organic）模式。在香港，相較於泛民陣營自身的

分化，雨傘運動過後出現的新興本土派政治團體，無論在人脈或組織上都與傳統泛民欠缺有機的聯繫，可以說從民主化到本土化每一次議題架構的分歧都會創造新的「片段」。雨傘運動之後支持本土派的大專學生會紛紛退出學聯，就是為了斬斷過去長久以來泛民和社運連結的傳統。當時推動退聯的同學說：「學生會、學聯、社運跟泛民是一個產業鏈嘛！所以，你現在斷了學聯就是斷了他們產業鏈嘛」（訪談編號 HK170201）。相較而言，儘管台灣反對運動內部也一直存在分歧，但是在「黨外」這個名號下卻保持「鬥而不破」的狀態。儘管成員的組成或統或獨、或左或右，都是為了對付一個共同的敵人而湊合在一起（李旺臺 1993: 3-4），不斷在組織政黨的目的下尋求共識。謝長廷（1983: 18）認為，路線的分歧就是因為走向組織化，這是一種團結而不是分裂。當時公政會和編聯會相鬥的時候，謝長廷反而認為是正式組黨前各司其職的作法：「政黨的功能是什麼？就是要提名候選人、研究公共政策、宣傳理念。把這些功能拆開，負責研究政策的就是後來的公政會，宣傳理念就是編聯會，提名就是後援會，組織就是後援會的分會」（引自陳儀深 2013: 425-6）。當時積極推動組黨的尤清和謝長廷，²² 他們都強調黨外組建政黨的共識氛圍與台灣人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時代民主抗爭的歷史經驗有關。尤清認為：「所謂組黨準備充分，是如何歸納黨外意見，也就是建立共識，以免又造成日治時代文化協會和民眾黨的分裂，這是台灣人的慘痛教訓」（引自陳儀深 2013: 48）。謝長廷則提到：「黨外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就是要建黨，美麗島事件之所以那麼多人被抓，就是因為要建黨；《自由中國》的雷震被抓也是因為要建黨」（引自陳儀深 2013: 425）。

22 就在黨外爆發「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的爭議時，其實也開始積極討論「應該組成何種形式的政黨」這樣的問題，當時謝長廷、尤清先後提出接近美國式的「柔性政黨」和西德式的「綱領政黨」不同的主張。可參閱謝長廷，〈黨外應該朝柔性政黨發展〉，《政治家》第 35 期（1982 年 8 月 16 日）。尤清，〈黨外應該朝柔性政黨發展〉，《博觀》第 2 期（1982 年 10 月 1 日）。《博觀》是尤清在 1982 年所創辦的黨外雜誌，就是為了成立新政黨在做準備。

台港同樣面對反對運動的內部分歧，也都在有限選舉的制度下爭取民主的權利。不過，對比之下，台灣黨外在威權時代結社與言論自由上遭受極大的限制，因而有一些特殊且非正式的機制凝聚各方力量，特別是平時透過「政論雜誌」的出版，到了選舉時則成立所謂的「助選團」。1977 年五項地方公職選舉時，在黃信介和康寧祥的介入下促成全省申聯，選舉期間兩人巡迴全省助講。到了 1978 年底進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成立了「全省黨外助選團」（由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組成），並且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作為黨外候選人的共同政見，這是黨外首次的共同政見，涵蓋廣泛的民主改革議題，突破了《大學雜誌》時僅涉及「國會全面改選」。它表達政黨應該涵蓋的面向，而不只是異議分子抗議某一種壓制而已（新台灣研究文化基金會 1999a: 115）。此時已經可以看到一種競選組織平台的出現，並提出挑戰政治體制層次的共同政見（徹底遵守憲法、解除戒嚴令等）。原先的觀望者紛紛加入，黨外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胡慧玲 2013: 107）。其後，每逢選舉都會成立這樣的競選平台來凝聚黨外力量。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康寧祥與江春男先籌辦《八十年代》雜誌，再組織「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來統合黨外力量。黃信介和施明德等人則創辦了《美麗島》雜誌，其後接續成立「黨外民意代表聯合辦事處」，簡稱「黨外總部」，想要形成美麗島政團。擔任執行秘書的施明德認為，要把競選時期的助選團延續到承平時期的黨外總部，要推動一個「沒有黨名的黨」，一定要另起爐灶，以組織對抗組織（新台灣研究文化基金會 1999b: 185；陳世宏、張建隆 2001: 737）。相較於《八十年代》純粹以雜誌來批判黨禁的方式，《美麗島》自始就是以「辦雜誌行結社之實」，企圖以組織化的實際行動挑戰禁忌（彭琳淞 2007: 35）。在美麗島事件過後，1981 年進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成立「黨外推薦團」，有別於過去的助選和助講，這次更透過若干原則的商定，向選民推薦各地區的黨外候選人，一種類似政黨的提名協調制度開始出現了。黨外在這次選舉中的組織化行動、具體的領導核心、統一的政治符號，已具備「雛型

政黨」的條件（李筱峰 1987: 177-178）。1983 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黨外公職人員成立「黨外中央後援會」（開始使用「中央」一詞），同樣想採取更為組織化的方式以及提名推薦制度，不過當時黨外新世代批評這種由領導人物發動的後援會或推薦制度，都是由上而下的形式，應該進行由下而上的動員。這些年輕世代搶先在後援會成立前，自行籌組編聯會。首任會長林濁水指出，編聯會要形成一個黨外內部的壓力團體：「堅持民主原則，以形成黨外內部的民主壓力。並為黨外進一步組織化建立基礎」（林濁水 1991: 13）。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黨外的內部分歧或衝突，但是，同樣可以說這是黨外組織化過程中民主化的開端（李筱峰 1991: 189；廖權修 2016: 38-39）。黨外的組黨模式也逐漸揚棄了以公職人員為主的領導體制，「以外造政黨的組織模式，更緊密地把『編聯會』和『公政會』這兩派運動者『箍』在一起，也更適合去發展議會運動和群眾運動的雙線並行」（蘇彥圖 2021: 224）。黨外從早期各立山頭、單打獨鬥的局面，經過「串聯」、「助選」、「共同政見」、「提名推薦」，運動過程中的內部分歧不斷被吸收進組織化與民主化的整合性發展過程中，最終到民進黨成立之後成為黨內民主運作和派系政治的基礎（鄭明德 2004: 90-91）。

不同於台灣以黨外雜誌來結合政治運動菁英進行組織化的企圖，香港的集體抗爭在現代網路科技的影響下，人們透過各種網路社交媒體與論壇，去傳播和接收資訊，乃至於形成各種自發性的集體行動。在 2003 年七一大遊行時，就可以觀察到網路新媒體發展對運動的影響（李立峰、陳韜文 2013: 261），2019 年反送中期間的運作可以說達到高峰，為這個無大台的運動提供了基礎。當時除了街頭抗爭之外，市民也透過網路作為組織媒介，進行各種自發且多元的集體行動。例如，各類的網路眾籌、手牽手的人鍊活動、各大商場快閃齊唱、依照網路訊息形成的黃色經濟圈。相較於台灣黨外雜誌大多由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菁英經營和發行，現代的網路媒體具有個人化與去中心化的特點，在網路世界中任何市民都有參與討論、傳播資訊的機

會。透過不同議題組成的群組，志同道合者得以結合連繫起來。透過網路媒體可以讓原本非主流或從屬的團體擁有提出另類論述的空間，然而，這樣的科技機會在香港反對運動中卻形成嚴重的網路言論對立現象（Lee 2020: 21）。特別是雨傘運動前後，不同陣營的支持者在社群網路上激烈論戰交相指責，並以「左膠」、「大中華膠」、「右翼法西斯」相互汙名化。在對峙型的國家性狀態中，這些各擁立場的網路媒體、論壇群組相互攻擊，增加共識動員的困難，讓香港出現了不是單一而是複數的對抗型公共領域（counter-public sphere）（Lee 2019: 182）。相較而言，在台灣戒嚴體制下，黨外雜誌只能單向度進行由上而下且有限的理念傳播。儘管不同的雜誌之間存在著政治運動菁英的分歧，不過，辦雜誌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突破言論箝制（民主化），彼此的分歧不會無限地擴張延伸。例如，《美麗島》創刊之後，傾統人士也仿效創辦《春風》這個運動性刊物，不讓《美麗島》專美於前。然而，在人事組成上，《春風》社長王拓和總編輯蘇慶黎同時是《美麗島》的重要編輯。這正說明當時黨外運動人士「統獨」不明顯或刻意淡化，彼此尚能以「朋友」和「同志」來相互支援（彭琳淞 2007: 724）。

在成立選舉平台方面，2016 年立法會選舉前，佔中三子之一的港大教授戴耀廷就提出「雷動計畫」的構想，希望透過「協調參選」、「策略投票」等作法來讓非建制派的直選席次一舉過半。戴耀廷所推動的正是一個政黨的提名與配票制度，可以說是通過選舉進行組黨計畫，一種組織化的努力。事實上，從比例代表制實施以來，面對建制派的競爭、議席極大化的考量，策略投票就一直是泛民政黨選舉策略的焦點，只是往往成效不彰。儘管如此，戴耀廷卻認為雨傘運動後低迷的民主運動提供了由下而上來推動策略投票的機會。他認為不讓建制派完全主導立法會應是「共同目標」，通過雷動計畫可以讓大家暫時放下分歧，抗爭才有出路（戴耀廷 2018: 30, 35）。若是非建制派能取得立法會議過半席次，憲制將變得不穩定，中共無法輕易透過建制派操弄特區的立法權，特首施政舉步維艱，就能迫使政權

正視港人的民意進行政改（戴耀廷 2018: 12, 52）。雷動計畫與台灣黨外競選平台很大的不同在於，是由「非政黨人士」而非「政治運動菁英」來推動，並且沒有訴求「共同政見」，只試圖以技術性的配票操作來讓「議會過半」，以此作為不同陣營的整合方式。雷動計畫只要求技術性的問題解決，而非理念問題的處理，在當時反對陣營內部路線嚴重分歧下遭遇許多困難。當時屬於本土派的熱血公民參選人鄭松泰，在一場電視論壇上表明拒絕參與計畫和協調：「我唔同你地協調，因為我有理念，你地無」（我不跟你們協調，因為我有理念，你們沒有），指責泛民的協調只是「分飯票」。²³事實上，2016年本民前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中，獲得了超乎預期的 66,524 張（15.4%）選票，讓本民前所象徵的本土勢力獲得了在傳統「建制／泛民」之外的政治空間，意謂著選民不再只看候選人的素質，也會在意政治路線。一位積極參與雷動計畫的受訪者很無奈地說到：

很煩哪！因為很多年輕人其實不喜歡泛民的人。雷動的效果就一般而已，因為政黨也不支持，政黨覺得其他人落選也沒關係，他自己黨的人有當選就好。本土派也不支持，就剩我們這批人。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碎片化嘛！就是分得太細了，團結不起來，你就不可能對抗建制嘛！（訪談編號 HK160201）

以策略投票來最大功利化議席的手段，無法適時回應選民的期望（鄭司律 2016），而高舉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二元對立，難免抹去內部政治路線的差異，將會令候選人的得票愈來愈無法反映其政治路線的實際支持，錯失以立法會選舉作為民主派內部良性競爭的重要平台（稻草 2016）。

23 〈戴耀廷提出雷動計劃爭立會過半 熱血公民拒協調：我有理念，你地無！〉，《獨立媒體》（2016年3月6日）。

在不同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台港兩地的反對運動在各自不同的國家性狀態中追求民主化，「中華民國台灣化」和「一國兩制」分別標示了「一致型」與「對峙型」，兩種不同的國家性狀態。在一國兩制下，任何民主化的推進自然強化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然而，愈明確的中港區隔和本土意識的增長，必然愈威脅到北京政權的國家性（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從而對香港民主運動予以鎮壓，導致中港之間陷入「再中國化／去中國化」、「中國國家性／香港國家性」兩極之間，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在與政權的外部激烈對抗過程中，泛民政黨的溫和路線受到挑戰，最終出現「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此種與中國政權毫無妥協、與內部不同陣營難以化解的激進主張。此外，由於香港反對陣營陷入難以調解的內部分歧，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才會出現「無大台」作為團結與整合的方式。至於 1970 年代的台灣，由於正統中國想像的殞落開啟了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史進程，相較於香港政治空間的不斷緊縮，國民黨為了政權的存續必須讓自身民主化，主動或被迫對反對運動做出讓步和妥協。緩和的國家性狀態讓反對陣營能一直整合在追求民主化的議題架構下，與威權政體進行對抗並持續擴大民主政治的空間。內部的路線分歧並未陷入難以調和與跨越的統／獨認同問題並產生嚴重分裂，反而通過內部的辯論推升民主運動的強度、強化信念，避免被國民黨收編、馴化，從而弱化了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調控能力（蘇彥圖 2021: 218）。本節相關分析的比較整理請參見表 3。

七、結論

儘管有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此種帶有命運共同體意涵的論述出現，但是，對照台灣和香港在 2014 年之後的經驗來看，兩地「民主分流」（democratic divergence）現象明顯可見。在台灣，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力量相互推進，本土意識伴隨著民主的深化，而香港的自我身分認同愈強烈北京政權的鎮壓也愈強硬，進而造成全面民主

表 3 台灣和香港反對運動分歧內容與發展型態比較

| | 香港 | 台灣 |
|--------------------|--|-----------------------------------|
| 國家性類型 | 對峙型 (一國兩制) | 一致型 (中華民國台灣化) |
| 代表團體 | 泛民政黨／本土派 | 公職人員／黨工 |
| 外部的議題架構 (第一條戰線) | 民主化(民主／威權) 本土化(再／去中國化) | 民主化(民主／威權) |
| 內部的分歧內容 (第二條戰線) | 民主回歸／中港區隔 和理非非／勇武抗爭 左翼／右翼 民主自決／民族自決 | 議會路線／群眾路線 體制內改革／改革體制 雞兔同籠問題 |
| 反對運動的型態 | 激進化程度高 | 激進化程度低 |
| | 組織化程度低 (離心的、片段的) | 組織化程度高 (向心的、有機的) |

倒退的現象。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反對運動最困難的是，他們抗議的對象其實並不在香港，香港政府的正當性來源也不在香港人民，而是北京政權，這會大大增添民主運動的阻力。同樣地，不同於「立足在台灣」的國民黨需要迫於形勢來改變統治策略維持正當性，中國共產黨面對香港的反對運動，根本不需要進行民主化或本土化的轉向，因為香港不是其政權正當性的根本所繫。國家政權與反對運動很難建立起雙向的互動，香港反對運動難以面對強大的特區政府及其背後的北京政權所形成的壓制。港人無法避免地在抗爭與鎮壓之間循環，愈大的抗爭帶來北京政權愈大的打壓，難以緩衝的本土意識也不斷地被激化，進一步與中國「偉大的民族復興」直接衝撞。香港本土派直接選擇以香港獨立的激進立場來突破困境，不僅形成內部身分認同的分歧（或本土意識的強化），最終也遭受到共產黨政權全面的鎮壓。台灣同樣發生反對運動激進化的現象，但是，「一個預先存在的具正當性的政治邊界，給予台灣在解決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問題上不可或缺的要素——『時間』」（吳叡人 2016: 41）。在中華民國台灣化和第三波民主的大環境下，台灣進行了溫和的民主改革，新舊勢力並沒有進行如革命般的激烈對決。然而，從雨傘運動一直到反送中運動，香港

可以說是處於快速的、被壓縮的民主化被毀滅的進程，反對陣營在第一條戰線上與國家政權進行激烈的對峙，內部的路線分歧無法獲得不同陣營之間的辯論和選民的驗證，達成辯證性的整合。最終，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只能以無大台的方式擱置一切矛盾與爭議，以同歸於盡（攪炒）的決心來面對香港始終受困的民主情境。

本文從「激進化」與「組織化」這兩個面向，進一步對台港兩地在分歧的內容與型態差異做出說明與解釋。香港持續的離心與分裂的狀態終至無大台，台灣卻在分歧中產生向心與整合的力量，反對黨的成立將民主政治從壟斷性體制帶入競爭性體制。不過，筆者從國家性此種結構性的角度出發，並無意將相關分析陷入結構決定論或命定論的立場，而是希望去理解在這樣的結構條件下，台港兩地不同的反對運動者或團體的選擇、限制與可能性。同樣地，筆者也無意擴大國家性此一結構條件的普遍解釋力，更無意忽略行動者的能動性，只是身處在當前中國極權政體的周邊，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國家性對台港兩地民主化的獨特影響力。在中華民國台灣的國家性狀態下，並不代表能自動成為民主順利轉型的動力，仍需要行動者的勇氣與努力。正如吳乃德（2020: 207）在回顧黨外歷史時所說：「對我們而言，民主化的成功是過去，他們沒有被逮捕也是過去的事情。可是對當時的行動者而言，這些都是不可知的將來。」同樣地，直到一國兩制的對峙狀態下，才讓港人意識到長期經濟自由繁榮的背後，忽略民主與國家性議題的代價。如今在國安法的全面鎮壓中，香港的民主運動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借鏡於台灣，民主化前進的動力總來自於歷史機遇下人的能動性。如同過去幾年港人在面對極大的結構困境，以及幾乎無法調解的內部分歧中，爆發了最全面且自發性的反送中運動，在未來的不確定性中，香港仍然可以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民主化之路。筆者認為，或許港人會在結構強制的無奈中為「不斷被拖延的民主化」發出悲鳴，但是，不也正是港人自身的持續努力才讓香港回歸中國之後能夠「不斷去推遲極權化」？

除了 2014 年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之間的相互影響之外，在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我們可以更明顯地感受到「台港連動」的政治現象。反送中運動的效應改變台灣內部政治（特別是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乃至於兩岸關係，以及台灣在區域和國際上的定位（馬嶽 2020: 217, 236）。我們可以發現到，隨著台灣民主的不斷深化增強了對國家正常化的追求，讓台灣的政治對立或第一條戰線的議題架構，從原本的「統／獨」爭議，逐漸轉變為「親中／反中」這樣的主軸。台灣當前的國家性狀態已不再純粹糾結於國內的族群政治，而是與中國國家性（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直接對立。筆者認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挫敗帶來的衝擊，讓台灣從野草莓學運、反媒體壟斷、太陽花學運，對中國因素的抵抗變得具體明晰起來，更為深刻地進入台灣人的政治意識之中。隨著中國威權主義持續擴散，北京政權也不斷在挑戰中華民國台灣已然建立的國家性狀態。除了透過「民主防衛」來防備中國藉由經濟吸納、武力威脅、文化交流所欲達成的政治控制之外，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雙方日益強烈的國家性對峙下，中華民國台灣是否仍可作為可持續的形式？是否能確保台灣民主深化的腳步？我們應該從香港民主化的困境來汲取相關的教訓和啟示。

致謝：本文是國科會計畫的部分成果（計畫名稱：反對派是如何煉成的：在中國因素下香港反對運動的敗局困境（MOST108-2410-H-431-020-MY2）），感謝國科會的經費支持。本文初稿曾先後發表於2021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和2022年台大社會系舉辦的「劇變中的香港學術研討會」，感謝吳介民和蘇彥圖兩位老師的評論意見，吳介民為「台港國家性變遷示意圖」提供最初的構想，蘇彥圖〈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一文令筆者深受啟發。此外，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編委會提供給我許多寶貴的建議。儘管在回覆上令人不時感到棘手，最終修改的成果卻超乎筆者的預期和想像，讓個人在寫作上充滿著收穫與成長。最後，還要感謝那些必須匿名但對本文形成有所貢獻的朋友們。

參考文獻

-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 129-208。
-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71-116。
- 孔誥烽，2022，《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港》。台北：左岸文化。
- 古淑芳，1999，《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包斯文，1980，〈兩條路線，兩種策略：「美麗島」雜誌創刊之後〉。頁 77-85，收入包斯文編，《黨外人士何去何從？》。台北：四季。
- 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
- 艾琳達，1998，《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台北：前衛。
- 李立峰、陳韜文，2013，〈初探香港「社運社會」：分析香港集體抗爭行動的型態和發展〉。頁 243-269，收入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編，《香港·論述·傳媒》。香港：牛津大學。
- 李旺臺，1993，《台灣反對勢力（1976～1986）》。台北：五千年。
- 李祖喬，2018，〈勇武抗爭：香港的知識分子與暴力／武力的觀念〉。頁 207-221，收入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李筱峰，1987，《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
- 吳乃德，1992，〈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從黨外到民進黨內部的分歧〉。頁 77-102，收入鄭文聰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台北：自立晚報。
- ，2000，〈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台灣政治學刊》4: 57-103。
- ，2020，《台灣最好的時刻 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台北：春山。
-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 159-198。
- ，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左岸文化。
- 吳介民、李丁讚，2008，〈生活在台灣：選舉民主及其不足〉。《思想》9: 33-68。
- 吳叡人，2016，《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新北：衛城。

- 吳靄儀，2018，《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香港：牛津大學。
- 何俊仁，2010，《謙卑的奮鬥》。香港：香港大學。
- 林怡廷，2016，〈香港年輕人追求民主 他們從台灣經驗看到什麼？〉，《天下雜誌》。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9087>。
- 林濁水，1991，《路是這樣走出來的》。台北：前衛。
- 周琇環、陳世宏編，2000，《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新北：國史館。
- 杭之，1990，《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台北：允晨文化。
- 胡慧玲，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三，民主的浪潮》。新北：衛城。
- 若林正丈，2016，《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馬嶽，2012，《香港 80 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2020，《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新北：左岸文化。
- 馬嶽、蔡子強，2003，《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徐承恩，2017，《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台北：左岸文化。
- 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
- ，2015，《左膠禍港錄：香港政治困局大解謎》。香港：花千樹。
- 陳世宏、張建隆編，2001，《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三）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新北：國史館。
- 陳芳明，1989，《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反對運動與民主台灣》。台北：前衛。
- 陳儀深，2013，《從建黨到執政：民進黨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台北：玉山社。
- 康寧祥，1983，《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
- ，2013，《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台北市：允晨文化。
- 黃毓民，2016，《公投制憲 香港維新》。香港：普羅政治學苑。
- 黃德福，1992，《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
- 湯志傑，2006，〈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學》12: 41-190。
- ，2007，〈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13: 71-128。
- 彭琳淞，2007，〈自由·民主·本土·台灣：看台灣戒嚴時期的政論雜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 30-40。

- 楊旭聲，1983，〈台灣黨外運動的三大波〉。頁 33-65，收入風雲論壇編輯委員會編，《透視黨外勢力》。台北：風雲論壇社。
-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1999a，《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台北：時報文化。
- ，1999b，《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文化。
- 稻草，2016，〈大局之中，還有大局——為雷動說句真正的公道話〉，《獨立媒體》。取自 <https://www.inmediahk.net/> 政經 / 大局之中，還有大局——為雷動說句真正的公道話
- 戴耀廷，2018，《思考香港系列 4——雷動：策略的思考》。取自 <https://bennytai.github.io/HongKongReflections/>
- 廖權修，2016，《新潮流系與八〇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子強、馬嶽、陳雋文，2021，《特區選舉：制度與投票行為》。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蔡盛琦，2008，〈《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刊》15: 159-208。
- 鄭司律，2016，〈不只策略，更需方向的雷動計劃〉，《獨立媒體》。取自 <http://www.inmediahk.net/> 社運 / 不只策略，更需方向的雷動計劃
- 鄭明德，2004，《一脈總相承：派系政治在民進黨》。台北：時英。
- 鄭祖邦，2019a，〈在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歧與整合：2003 至 2016 年〉。《台灣社會學》38: 115-161。
- ，2019b，〈中國的天朝主義：一個未／無法完成的現代民族國家〉。頁 395-427，收入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2022，〈香港民主運動的困境：一種「國家性」觀點的解釋〉。《台灣民主季刊》19(4): 43-82。
- 鄭焯、袁瑋熙編，2018，《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練乙錚，2016，〈魚蛋革命防港變大陸 持續高壓壓出二二八〉，《信報》。取自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1238641/multimedia>
- 謝長廷，1983，《黨外黨》。台北：關懷之聲。
-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5: 195-250。
- 蘇彥圖，2021，〈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與憲政思辨：80 年代台灣反對運動路線

辯論的意義與影響》。頁 191-228，收入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編，《威權鬆動：解嚴前台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新北：國史館。

- Alimi, Eitan Y., Lorenzo Bosi, and Chares Demetriou. 2012. "Relational Dynamics and 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7(1): 7-26.
-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471-499.
- Cheng, Tun-Jen and Yung-Ming Hsu. 1996.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Pp. 137-173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edited by Hung-Mao Tien. New York: M. E. Sharpe.
- Chiu, Stephen Wing Kai and Tai Lok Lui, eds. 2000.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obert A. 1966. "Patterns of Opposition." Pp. 332-347 in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ited by Robert A. Dah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uverger, Maurice.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Fong, Brian C. H. 2013.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Governing Coalition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Asian Survey* 53(5): 854-882.
- . 2019. "Advisory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1997: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Pp. 109-122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edited by Tai-Lok Lui, Stephen W. K. Chiu and Ray Yep. New York: Routledge.
- Ho, Ming-Sho. 2019.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p, Iam-chong. 2020.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Kuan, Hsin-Chi and Siu-Kai Liu. 2002. "Between Liberal Autocracy and Democracy: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Democratization* 9(4): 58-76.
- Lee, Francis. 2019. "Opinion Media: From Talk Radio to Internet Alternative Websites." Pp. 170-184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edited by Tai-Lok

- Lui, Stephen W. K. Chiu and Ray Yep. New York: Routledge.
- . 2020. “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1): 18-32.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 Sonny Shiu-Hing. 2015. *Hong Kong’s Indigenous Democracy: Origins, Evolution and Contentiou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Ma, Ngok. 2002. “Factionalism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2000 Election.” Pp. 125-160 in *Out of the Shadow of 1997?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dited by Kuan Hsin-Chi, Lau Siu-Kai, and Timothy Ka-Ying W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 2014. “Increased Plu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 Party System and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he 2012 Elections.” Pp. 185-209 in *New Trend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edited by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 2015. “The Rise of ‘Anti-China’ Sentime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2012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China Review* 15(1): 39-66.
- . 2019. “Party Underdevelopment in Protracted Transition.” Pp. 139-152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edited by Tai-Lok Lui, Stephen W. K. Chiu and Ray Yep. New York: Routledge.
- Ma, Ngok and Chi-Keung Choy. 2003. “The Impact of Electoral Rule Change on Party Campaign Strategy: Hong Kong as a Case Study.” *Party Politics* 9(3): 347-367.
- Pepper, Suzanne. 2008.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Ragin, Charles C. 2014.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o, Alvin. 1997. “The Tiananmen Incident, Patten’s Electoral Reforms, and the Roots of Contested Democracy in Hong Kong.” Pp. 49-83 in *The Challenge of Hong Kong’s Reintegration with China*, edited by Ming K. Ch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an de Walle, Nicolas. 2006. "Tipping Games: When Do Opposition Parties Coalesce?" Pp. 77-92 in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edited by Andreas Schedl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Veg, Sebastian. 2017. "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vic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230: 323-347.

Wu, Rwei-Ren. 2016.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4): 686-705.

附錄 1 訪談紀錄一覽表

| 訪談編號 | 受訪者身分 | 訪談日期 | 訪談地點 |
|----------|-----------|------------|------|
| HK160101 | 本民前核心成員 | 2016/06/03 | 香港 |
| HK160201 | 傘後組織成員 | 2016/08/14 | 香港 |
| HK170201 |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 | 2018/03/26 | 台北 |
| HK180101 | 香港民族黨核心成員 | 2018/06/02 | 香港 |